

新疆域的探索与治理

王泠一

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点,是在下一次产业革命——也许是和 ICT(信息、通信和技术)有关,或者是和生物制药有关。

美国退出《巴黎协定》,中国坚持维持,如何理解这一“退”一“进”之态势?近日,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指出,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警惕和中国的战略自信:其实所有的国家战略最后都是为了本国利益和可持续发展,但是中国在其中特别强调和平开发。

新疆域探索进行时

杨剑在最新研究成果《深海、极地、网络、外空:新疆域的治理关乎人类共同未来》里,将深海、极地、网络和太空称为新疆域。人类的活动在这些新的疆域中不断延展,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经由这些新的疆域变得更加紧密,与此同时,新疆域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问题也日益凸显。那么,现在就到了讨论新疆域秩序构建的时候了?是否为时过早?

什么样的速度才是人类探索外空的合适速度?或者说,对每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,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做出最了不起的事情?杨剑认为,这个“速度”和这个时代的主题相关。例如,当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的时候,老百姓就会觉得太空军备竞赛毫无必要。这里还有一个引申问题:在整个新疆域里面,只有那些技术发达、拥有大国实力的国家才能参与构建。中国正因为有了“嫦娥计划”,才成为航天俱乐部的成员;有了“雪龙号”、在南北极都建有科考站,所以才是极地的成员国;有了“蛟龙号”,才能去深海。

这些新疆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,英文叫“global common”,即共同地方;它的产权应当属于全人类。那么,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大的花费去处理全人类的问题?这里有一个平衡点:要保护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探索新疆域的积极性,给予回报;与此同时,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技术,让这些国家把新疆域或其中资源占为己有,要找到两者的平衡点。按照经济学来讲,就好比商人们都希望在这个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收益,而与此同时,这种竞争会让整个社会获得更



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

多的财富。

新疆域内在活动的增加,虽说不像当年美苏争霸时那么激烈、快速,但发展势头迅猛,现在私人企业也开始加入。还有一个问题是,天上卫星越来越多,太空垃圾也随之增加,万一哪天在空中相撞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这些都将成为新疆域的治理问题。

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新疆域治理

中国经济蓬勃发展,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。各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。单一的“中国制造”已经发生转变。如现在的“一带一路”,输出资金,被称为“capital from China”(来自中国的资本);不仅输出资金,我们还输出知识产权,如华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,拥有“IPR from China”(来自中国的知识产权)。世界依赖中国,中国也依赖世界。

现在,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问题,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准备违背原先自己设定的全球化原则,倒退回去,以单一国家利益为主来考虑问题。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,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。

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,但现在会否出现一个暂时的停顿?回到开头美国退出《巴黎协定》这一点,美国说要把自己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,不考虑全球气候变暖对别国产生的影响。如果每个国家都是类似政策,那么就会变成

“公地悲剧”(the tragedy of common)。“各扫自家门前雪”——楼道里却堆满垃圾,滋生蚊虫,最后连自己家里也不干净。

那么,在全世界范围内,“联合国”是不是一个像物业一样的存在呢?杨剑认为,国家有政府,政府会安排好所有公共事务;但不存在一个“世界政府”,“联合国”只是一个国家政府间的合作平台,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权力去解决公地上的矛盾。习主席提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概念,其中新疆域发展有四大原则:第一是和平,和平是发展的基础;第二是主权,尊重主权,包括海洋主权、网络主权等;第三是普惠,使得全人类受益于新疆域发展;第四是共治,共同参与事关人类未来的治理。因此,新疆域也是新空间。

对于新疆域的治理,我们同样也要仰赖一些自发动力的持续。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新力量产生,一些专业人士自发组成社会环保组织,拿出资金和时间来,关注人类利益,推动全球治理和绿色革命。这是一股积极的治理力量。

要尝新 更要创新

我国在过去 30 多年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,在短时间内同时完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程。在新疆域中,也从“边缘国家”,进入“半边缘国家”,现在已经成为“核心国家”。

曾经,由于国外拥有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,似乎我们

只要打开国门,好好去学就行了——我们尝新的节奏非常快。可以说,这一模式是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。但是,国外技术有朝一日也会用完,再往下要再“尝”新的东西,就得自己来创新。

杨剑认为,有一个案例足以提醒我们警惕,那就是日本在创新以及处理对美关系上的完全失败。在 1980 年代,买洗衣机、录音机、电视机,人们都会选择购买日本货,日本能够认真地把每个流水线的细节做到最好、最精致。但是日本并没有在创新上和美国站在一个平台上,1990 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革命中,日本一下子落后了。所以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点,是在下一次产业革命——也许是和 ICT(信息、通信和技术)有关,或者是和生物制药有关。它发生之际,一定是经济特别繁荣的时候,就跟 1990 年代的繁荣一样。杨剑指出,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提高。在下次产业革命到来时,如果美国是产业革命的策源地,中国也必须是两个策源地之一;如果美国要分割全球市场,中国应当也分割三分之一以上的全球市场。

杨剑最后说:“中国要继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;另外,已没有那么多巨人可以让我们站了,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巨人,跟另外一个巨人肩并肩。那个时候,中国作为一个引领世界的国家,不仅贡献最好的创造,还要贡献最好的文明。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。”(张羽凡、朱小千对此文亦有贡献)

美国女孩的俄国梦

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 1920 或 1930 年代的独立、爱冒险的美国女性,希望逃避布尔乔亚生活的约束和妥协,你能想到的是什么?第一反应可能是巴黎、左岸。但你会想到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荒野吗?

这个选择并不像现在看来那么不寻常。正如朱莉娅·米肯伯格 (Julia L. Mickenberg) 在《红色俄国的美国女孩》里揭示的,“失落一代”的故事还有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对立面: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,俄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吸引了许多女性,包括主张女性选举权的活动家、改革家、教育家、记者和艺术家,还有好奇的旅人。其中有些人很著名,像舞蹈家伊沙多拉·邓肯 (Isadora Duncan)、剧作家丽莲·海尔曼 (Lillian Hellman); 有些人受到苏联伟大社会实验的影响,思想颇为激进。但所有这些女性来到俄罗斯,都是为了寻求更加公平、公正,令她们更满意的社会安排。

米肯伯格现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美国研究助理教授,她在这本新书里重新叙述了这些美国女性在俄罗斯的经历——从饥荒中拯救饥饿儿童,在西伯利亚的农村公社干活,为莫斯科或纽约的报纸写文章,或是在苏维埃的舞台上演出;并探讨了将美国妇女带到俄国的复杂动机:她们寻求的是革命新模式的模式,在这里,妇女不仅独立于男人,而且同男性一样,是新社会的建设者。毕竟,苏联妇女在 1917 年就获得了选举权 (美国妇女 1920 年获得选举权);此外,她们也早早享有了堕胎权、财产权、离婚权、生育津贴和国家资助的儿童保育权;即便是苏维埃少数民族的妇女,那时候也已经可以成为公众人物。不过,来到这个自由乌托邦的美国女性最后发现,经济、社会和性别不平等在哪里都不会少。

(编译/黎文)

